

● 青海省宗教局 编 ●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ZHONGGUO
YISILANJIAO
YANJIU

中国伊斯兰教研究

——西北五省（区）伊斯兰教学术
讨论会（西宁会议）论文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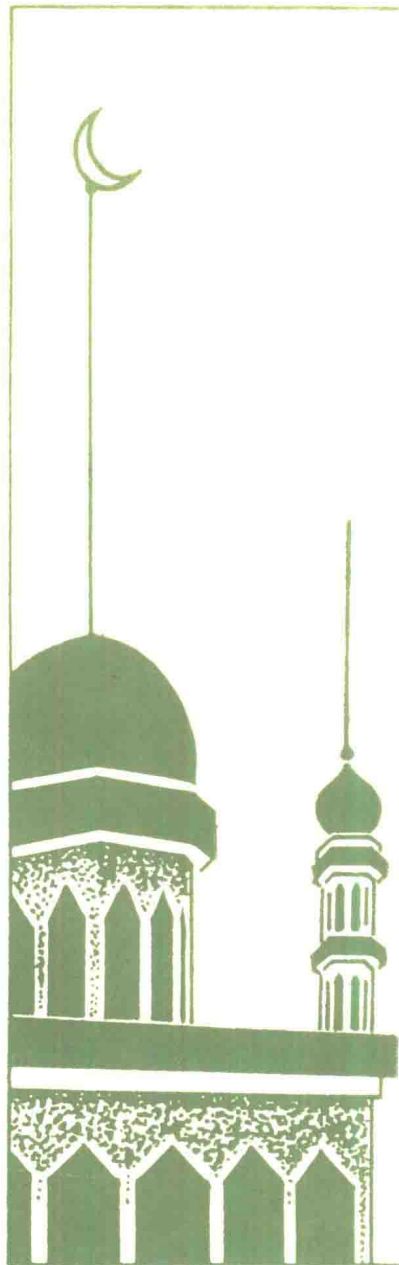
495
326
1

青海省宗教局

编

中国伊斯兰教研究

西北五省(区)伊斯兰教学术
讨论会(西宁会议)论文选集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西宁

中国伊斯兰教研究/青海省宗教局编 一西宁:
青海人民出版社, 1987·9
400页; 32开
ISBN 7-225-00062-4/C·2·; 2.20 元
I 中…II 青…III ①伊斯兰教; 中国-研究
VI.B969.2 49.5042 B96

中国伊斯兰教研究

青海省宗教局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兰州八一印刷厂制版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12,625 插页: 1 字数: 316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1,060

统一书号: 3097·891

定价: 2.20 元

ISBN 7-225-00062-4/C·2

目 录

-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……………任继愈 (1)
- 周密杂著所记回族史、伊斯兰教史资料初探……马士年 (9)
- 宋代的番客……………杨怀中 (44)
- 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
作用……………林 松 (83)
- 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
物评价问题……………马汝珩 (105)
- 苏非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……………金宜久 (120)
- 伊斯兰教哲学与回族伊斯兰教浅议……………冯增烈 (138)
- 《来复铭》析……………冯今源 (148)
- 从《清真大学》试论王岱舆宗教哲学思想的特
点……………余振贵 (172)
- 刘介廉和他的《天方至圣实录年谱》……………纳兰珍 (184)
- 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在阿拉伯政治
统一中的作用……………马超群 (190)
- 略论明清之际回族等民族伊斯兰教新特点的
形成……………李兴华 (213)
- 从经堂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
——回族教育史上的巨大转折……………王永亮 (245)
- 伊斯兰教传入湖南以后的概况……………韩海潮 (259)
- 青海回族来源初探……………孔祥录 喇秉德 (267)
- 从分裂到团结的陕西伊斯兰教教派……………冯钧平 (276)
- 阿拉伯的宛哈比派与中国的伊赫瓦尼派……………马 通 (291)
- 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在西宁的传播……………刘德文 (309)

略论依禅派的形成及其特点	王怀德 (319)
嘎的林耶门宦杨门始末	马福海 (335)
西道堂兴办教育记	马富春 (341)
保安族伊斯兰教门宦述略	高占福 (349)
青海地区的托茂人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	
.....	李耕砚 徐立奎 (358)
南疆的麻扎和麻扎朝拜	马品彦 (369)
阿古柏对新疆伊斯兰教的利用	马苏坤 (387)
后 记	

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*

任继愈

宗教与哲学这两个学科，最早是没有划分的。愈到近代，学科就分得愈细，这二者也就分开了。在古代，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，逐渐地产生了宗教。从人类学、考古学来看，宗教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有了宗教，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。动物是没有宗教意识的，儿童也是不会自行产生宗教意识的。只有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分化以后，产生一种崇拜的意识，这时才有宗教的概念。大家知道，最早由于生产力的低下，人们对自然现象有神秘感，对自然无能为力，但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界作斗争，在生产斗争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一种异己的力量。对这种异己力量人们又无法正确理解它，又不能制服它。这就是产生宗教的认识论的根源。宗教的出现，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。

宗教最早称为原始宗教。由于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，而天灾人祸、毒蛇猛兽又时时威胁着人们。整个氏族都是共同生活，共同生产劳动，共同分配，共同抵御外界的威胁，也共同举行一些祈祷的仪式。带头的往往是氏族中最有威望的人。因此当时人人都信仰宗教，无一例外，而且也没有专职的宗教职业者。

宗教起源是很早的，而哲学只是在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。因此，哲学最多也只不过几千年的历史。哲学是一种世界观。只有在人类有高度的抽象思维之后，才能形成哲学世界观。从历史上

* 该文是任继愈同志1982年8月22日在西北五省（区）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（西宁会议）上所作的报告。

看，宗教流行的范围比哲学广得多。现在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没有宗教，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。因为哲学是一种思辩之学，而宗教是一种信仰之学。宗教只是从感情上、信仰上使人满足，而哲学是一种理性的、逻辑的、思辩的学问。人类没有高度的抽象思维，是不可能有什么哲学的。因此有原始宗教，但不能说有原始哲学。哲学一开始就为一定的阶级服务，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。

宗教与哲学有什么关系呢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，人类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，出现了一般学科所不能解答的问题。如：人为什么有灾难？为什么有人富贵，有人贫贱？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？为什么人的寿命有长有短？等等问题，其他学问都不能回答，有两门学问公开宣称可以回答这些问题，而且自信只有它们才能回答。这两门学问，就是宗教与哲学。因此，进入阶级社会后，宗教和哲学发生了关系，而且这种关系越来越密切。

宗教的历史很长，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，根子又很深。哲学往往依附于宗教，西方书上经常说，哲学是宗教的奴婢。

众所周知，阶级社会，即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，是少数人压迫、统治着多数人。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哲学，不管是哪一派，都要论证阶级社会的合理性，论证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是合理的。所不同的是，封建社会的哲学论证奴隶社会是不合理的，只有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；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哲学又论证封建社会的不合理，只有资本主义是万古长存的。因此，进入阶级社会后，宗教与哲学在行动上互相配合，在理论上又互相补充。因为宗教与哲学都是上层建筑，都要维护它自己的经济基础，特别是该社会的所有制。

在阶级社会中，特别是封建社会这一阶段，宗教得到很大发展，这值得引起注意。影响比较大的世界三大宗教（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）都是在封建社会时期才越出一国、一地区的范

围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，这都不是偶然的。在奴隶社会里，奴隶主靠暴力，靠刑罚，靠鞭子把奴隶管起来，奴隶被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。到了封建社会，劳动者有一部分自己的生产工具，地主用不着天天跟着他们，也不需要组织集体的劳动，而是把地租给劳动者，只要收取地租就行了。封建社会是一种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，统治者想加强自己的统治，巩固封建秩序，但又不能用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法，因此，这个时期，宗教和哲学就从思想上、伦理上制服劳动群众，让他们驯服。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，宣扬的就是忠君、孝顺、三纲五常。春秋时期，孔子还不是一个宗教家，而是一个教育家、思想家。但到了汉代，汉武帝、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，把儒家奉为一尊，把孔子的著作奉为经典，只能背诵，不能怀疑，把孔子本人奉为神，逐渐开始宗教化。东汉时期，佛教传入，还有在本土形成的道教。南北朝时，这三教并存。唐朝时，三教的地位都已确立了。当时国家遇到一些重要的典礼，都邀请三教的领袖人物在宫廷讲论。他们的讲论有一个发展过程。开始时，三教各讲自己的优点，攻击对方的弱点，到唐朝后期，三教多讲它们的一致性，而不去互争高低，有了互相融合的趋势。到了宋朝便进一步合流，并正式形成了儒教。儒教流行的地区就在汉族的广大地区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，是以反宗教的形式出现的，但它本身又有许多宗教的特征，它有经典，有教义，有流派，有体系。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论。不过现在在国内和国外，有一些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，是有一定根据的。

在阶级社会里，宗教与哲学是配合得很好的，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一样的。例如封建社会中忠君思想、三纲五常等，宗教和哲学的讲法是一致的，而且是互相配合的。哲学内部有争论，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。唯物主义流派中，有的力图从宗教影响中摆脱出来。西方哲学，特别是到了近现代，也是要力图摆脱

中世纪神学的影响。但这也会有一个过程，开始不那么彻底，到了后来才逐渐摆脱“上帝”，变成了纯粹哲学的思维。

阶级社会中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大概如此。

下面谈谈社会主义社会中，宗教与哲学的关系。这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新的课题。

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生产资料仍然是私有制，宗教与哲学同样维护这种私有制，因此宗教要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就不那么彻底，也不那么容易。社会主义社会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上面已经提到过，在阶级社会里，宗教与哲学同是当时的上层建筑，同为私有制辩护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宗教与哲学分开了。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，这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，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。而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社会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，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能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。

宗教是旧社会的上层建筑，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的遗留，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宗教和哲学在理论上是彻底分离开了，这是与以前任何阶级社会里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根本不同的地方。社会主义社会中，有工人阶级的哲学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，具体讲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而没有工人阶级的宗教。宗教世界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，是强调修炼内心，不包括改造世界、改造社会，更谈不上革命。但是，在社会主义时期，却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，它研究宗教发生、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，研究宗教的历史、宗教的社会作用、宗教与文化等的关系。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，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。

必须指出，在社会主义社会，在政治上，共产党人在建设“四化”事业中，与有宗教信仰的群众结成统一战线；但在世界

观上，共产党人与宗教界人士是对立的。正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立一样，这两者不能搞统一战线。这对我们宗教研究工作者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，我们必须永远坚持下去。在新出版的《中国佛教史》序言中我们讲得很清楚：“我们只讲清道理，对佛教作为宗教，我们批判的锋芒所向，是佛教的宗教世界观，而不是当前信奉佛教的群众；揭露的是佛教麻痹人民的宗教本质，而不是针对虔诚的善男信女。”（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一卷第17页，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）在世界观上要明确，要旗帜鲜明。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与信教群众长期合作，共同工作。

宗教研究和哲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：

建国三十多年来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宗教仅仅是开始，我们都在探索中前进。是对，是错，提出来我们大家共同研究、商量。

第一点，在社会主义时期，宗教研究如何为当前政治服务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各个研究机构，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研究机构，都是在党的统一宗教政策指导下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的。就拿研究所来说，国家要求我们对各种宗教的理论、现状、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。这种研究看起来好象与当前没有什么联系，但是只要是科学的研究结果，就可以为党政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。例如对教派的研究，只要我们对某一教派作科学的如实的研究，就可以为党政部门提供可靠的依据，这就是为当前政治服务。再如我们的开放政策，我们要与外国交朋友，如果不了解该国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、风俗人情，我们怎么能交朋友呢？在国内也如此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各兄弟民族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，也不利于团结各兄弟民族一道为“四化”而工作。这就是为现实服务。但这种服务是长期的，不能搞“立竿见影”。

宗教看起来好象离我们很远，但实际上与我们的现实生活、国

际交往关系很密切。如中东问题，这是一个全世界大国争夺的焦点，也是政治上很敏感的地方，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，是不应该的。这既是一个宗教问题，又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；既要研究历史，又要研究现状，不能偏废。

第二点，宗教研究从哪几个方面入手。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时，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：要对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、现状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。十几年来，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。这三者之间，恐怕理论研究更为重要。因为研究宗教的现状、历史，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将会掉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，迷失方向。研究宗教，这三个方面都要考虑到，但对于每个人、每个具体的研究单位，可根据各自的特点有所侧重，但都不能偏废。

第三点，我们宗教研究工作者要有一个立脚点，这个立脚点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。如我们研究一项课题，或对某一教派进行研究，就不能站在这一派的立场上，或成为这一派的信奉者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成了某一教派的神学家，这在历史上是有的，但不能成为宗教的研究者。没有正确的理论，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科研成果。

我们还听到有一种说法：如果你不了解宗教，不站在某一种宗教立场上，怎么能研究宗教呢？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也有。如：古代庄子和惠子同站在桥上观鱼，庄子看到鱼自由地游来游去，就说，这鱼有多快乐啊！惠子说：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这鱼快乐呢？二人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。现在理论上有一种说法，认为你不站在它那一边，怎么能理解它呢？你的研究可靠与否？还算不算数？我看这要作具体分析。宋朝苏东坡有一首游庐山东林寺的诗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苏东坡描写的是庐山风景，这里也透露了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。就是说认识一个事物，如离得太

近，反倒看不清，有一段距离，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。但也不能太绝对化，不能说离得越远，看得越清。就拿研究佛教来说，要进得去，出得来。进得去，要深入到佛教理论的内部，对它的经典、教义、教派要熟悉。出得来，就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，从更高的立脚点来剖析佛教。在道教研究中也有类似的争论。道教宣扬人修炼得道，能成仙升天。相传淮南子刘安一家人得道升天，连鸡犬都升天。道教反驳那些不信得道升天的人，说：你没有成神仙，你就没有资格知道神仙能升天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得道升天，你就得先成为神仙。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。譬如说，法学里有一门学科叫“犯罪学”，我想犯罪学家不可能是一个犯罪的专家吧。所以我们宗教研究工作者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而不是先变成教徒才能懂得宗教。正如懂得黑格尔哲学最深刻的并不是黑格尔及其学派，而是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。

还有一些善意的学者，说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一些教义是一致的。这种说法在客观上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害的。因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观，强拉在一起，既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，也伤害信教者的感情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。所以我们在互相谅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配合的基础上搞合作，这样会好一些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宗教研究所最近出版了佛教学者法尊法师的《集量论略解》。法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但他对西藏因明学有多年的研究，只要有学术价值，我们就尽力使它出版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，又要防止狭隘的门户之见。

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气魄、有能力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。对宗教界的著作、刊物，我们从来不批评，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正面阐述我们自己的看法。但另一方面，如宗教界放弃宗教立场，这也没有必要。马克思主义者研

究宗教有自己的原则，宗教界有自己的立场，不必要求舍己从人。双方互相谅解，才能更好地推动宗教研究的开展。

第四点，关于目前研究宗教工作者的队伍。看来这支队伍包括三种力量：第一种力量是全国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，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一支力量。这支力量在世界观上旗帜鲜明，研究内容也明确；第二种力量是宗教工作部门，如统战部、民委等部门中的研究力量。他们更多地接触实际，结合现状，这方面条件比较有利；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团体及其宗教学校。他们站在信仰者的立场上，“在教言教”，有丰富的宗教知识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有神论，也不应该这样来要求。目前这三种力量都在增长中。宗教研究工作是我们党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支研究力量能互相尊重、互相谅解、互相合作，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宗教研究努力的话，我们这个宗教研究是大有可为的。因为宗教研究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决不是少数人、少数单位所能包得下来的。只有全体宗教研究工作者（包括信教的、不信教的）群策群力才能把这工作做好，这也是我们对“四化”所作的贡献。

周密杂著所记回族史、伊斯兰教史资料初探

马士年

周密(1232—1298年^①),字公谨,别号草窗,又号四水潜夫、弁阳老人。原籍济南(今山东历城附近);宋室南渡,他的曾祖秘挈家随之南迁,到浙江吴兴(湖州)居住,所以公谨自称“湖人”;南宋亡后,公谨流寓杭州,居岳家杨氏宅。公谨长于诗词,著述很多,除诗、词集外,另有《癸辛杂识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齐东野语》、《浩然斋视听抄》、《澄怀录》、《志雅堂杂钞》、《云眼过眼录》等杂著。在他的这些杂著中,有好几种分别记载着一些有关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资料。这些资料,对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在回族地区的传播、发展等方面的研究,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。下面试对其杂著中的这类资料,作一初步的研讨。

①关于周密生卒年月,据陆侃如,冯沅君《中国诗史》及梁廷灿《历代名人生卒年表》均定为1232——1308年。另据夏承焘《唐宋词人年谱》引《癸辛杂识》后集《先君出宰》条说:“先君子于绍定四年(1231年)辛卯出宰富春,九月到任。……壬辰岁(绍定五年)余实生于县斋。”所以周密生年应为1032年。他的卒年,据夏《谱》说:“今案《杂识》纪年,以本年戊戌(1298年)七月为最后”。又说:“赵由祁《跋〈草窗保母帖〉于浩然斋》云,“辛卯(1291年)余同寿甫过浩然斋,弁翁俾赋诗题此卷,今已九春秋矣,诗尚未就,良可一笑。今公往矣,寿甫其宝之”。《跋》作于大德三年(1299年)子月(十一月)十日,是草窗确卒于大德三年之前。夏因此定周密卒年为1298年。

周密杂著中记载着不少有关回族形成渊源、生活、风习等方面的史料，还记载着一些与回族形成的来龙去脉、回族族称的来源等有关的名词，如“回回”、“回回沙碛”、“回回国”、“小回回国”、“南蕃回回”等。这众多的名词的确切含义各是什么？后文将分别作一些探讨。这里先对“回回”一词进行初步的研究。

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，根据史籍记载（包括周密杂著的记载在内），并与回族形成的时间相对照，可以清楚地了解“回回”一词出现在前，回族形成在后，这个新形成的民族，因为形成时期的历史原因，就把“回回”一词移作它的族称了。据目前所知，“回回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五《乐律一·凯歌》条中，这条笔记记录着沈括自制的《凯歌》五首，其中第四首的歌词是：“旗队浑如锦绣堆，银装背嵬①打回回，先教净扫安西路，待向河源饮马来。”《凯歌》是当时边疆战士歌唱军威、歌唱胜利的歌曲。这五首歌词是沈括任鄜延经略使时所制数十曲中的一部分。沈任经略使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制曲的较具体的时间，是在元丰四年至五年初（1081—1082年），正当沈率兵攻犯边的西夏军屡获胜利之际。这首歌词中的“回回”，大概指的是由河西到天山南北的回鹘。十一世纪初，西夏李德明与子元昊，借与北宋修好期间，集中力量向西开拓，“西掠吐蕃健马，北收回鹘锐兵”②于1028—1032年间，先

①背嵬：大将亲兵。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：“韩世忠、岳飞军中别置亲随军，谓之背嵬，‘勇德无比’。宋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九《背嵬》条：“沈存中《梦溪笔谈》载拱宸乐管之词曰：‘银装背嵬打回回’。背嵬者，大将帐前骁勇人也。”

②见《宋史》四百九十。

后攻下甘州、凉州，1035年占敦煌，河西走廊的回鹘都降顺了西夏，由中亚、新疆经河西走廊到内地的东西大道就被截断了。沈括在打败西夏军之际，缅怀汉、唐盛世，国威远及中亚，丝绸之路畅通的繁荣景象才写了《凯歌》的后两句，来表达他想乘胜“净扫安西路^①”，然后饮马河源的爱国热情。《凯歌》中的“回回”，为什么说可能指的是河西走廊以至天山南北等地的回鹘？根据岑仲勉《隋唐史》说：“回纥，于阆文或拼作Hve:hvu:ra，其前两音相当于‘回回’。”岑又在其所著《中外史地考证》下册《“回回”一词之语原》中，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^②，并在文中引用了清洪钧《元史译文补证》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。洪文说：“……至《辽史》始有回回之名，与回鹘并列，而《元史》则回回，回鹘彼此互称，纥转为鹘，鹘又转回，音有缓急，故传译不同。”岑文据此认为：“谓回回为回纥音转，似颇得其近。”岑文又以九世纪的于阆文文件中的“回纥”一词的写法与读音为依据，认为“回回”一词，“当本自天山南路之土语”，我同意这种说法。一般说来，民间土语传播必快而远，在沈括写

①安西，唐督护府名，贞观十四年置，治所先在西州（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达克阿奴斯城），唐高宗显庆三年移治龟兹都督府（今新疆库车。辖龟兹、于阆、疏勒、碎叶等四镇及葱岭以西诸羁縻州府。沈诗中的安西路，系泛指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的通路。

②岑仲勉《中外史地考证》下册《“回回”一词之语原》说：“考近年发现之于阆文文件中，常说及回纥人，其写法作Hvaihu:ra, Hvaihura, Hve:hvu:ra或Hvehva:ra, (J.R.A.S. Jan 1939, P. 87.)省去语尾后，则所余之式均为hvaihu, hve hvu或hve hva，又因语言转译时，韵母往往通变，故上三式得变如hvaihva，《切韵》回读如ghuai，北京Khuei，试比观之，便知当日于阆语对回纥人之称谓，转译国语时得变如回回矣。上种文件是九世纪遗物，比西辽前三百年，循是推之，《辽史》所云回回，当本自天山南路之土语。知者，《辽史》于居留东方之回纥，仍承唐代习用语谓之回鹘，不曰回回也。”

《凯歌》时，“回回”一词，大约已为西北边塞的人们所习用了。此后，到北宋灭亡以前，“回回”一词就在中外史籍中经常出现，并逐渐有了新的含义。

《辽史》卷三十《天祚帝纪》叙辽将灭亡之际，耶律大石率军西迁建立西辽一段说：“大石乃驻军寻思干^①，凡九十日，回回国王来降^②”。同书卷六十九《部族表》有：“大石率众西去自立为帝，所历诸部，附见于后”一段，说大石所历诸部共二十四，其中有“回回大食部”。大石于1124年西迁，约在1132年驻军寻思干，称帝在1134年，距沈括歌词中出现“回回”一词的时间约晚半世纪。这时，“回回”一词也已出现在中亚一些地方，并被用作国名，部族名，对此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。让我们把中亚的历史帷幕拉开，追溯到八世纪初。当时正是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之际，倭马亚王朝^③的军队，征服了喀布尔的突厥人，还攻占了撒马尔罕地区。之后，到八世纪中期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继续东伸，与唐帝国的西疆相接。阿拉伯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，在其统治下的中亚各族人民很自然地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信仰者。到了九世纪中叶前后，阿拔斯王朝^④日趋衰落，中亚先后崛起了一些波斯人、突厥人建立的大小王国。这些王

①寻思干：即今撒马尔罕，在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中部泽拉夫善河谷地。

②回回国王：即花剌子模王，元代对花剌子模普通都称回回国。

③倭马亚王朝：公元661年1月，穆罕默德逝世后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，在岸法遇刺身死。当年，叙利亚封建贵族拥立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家族穆阿威叶为哈里发，定都大马士革，开始了哈里发世袭制，称倭马亚朝（661—750年）。倭马亚朝旗色尚白，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。

④阿拔斯王朝：倭马亚朝末期，阿拉伯帝国范围内的中亚、两河流域，叙利亚、北非、西班牙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。750年，起义军推翻了倭马亚朝，穆罕默德的叔父的后裔阿拔斯借机取得哈里发位，建阿拔斯朝（750—1258年），定都安巴格，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，迁新都巴格达，该朝旗帜尚黑，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。